

一、臺灣農村的黃昏

——西部農村訪問記實

楔子

農村，是中國人土生土長的地方。一個人，一個集團，一個民族，到了忘記他的土生土長，到了不能對他土生土長之地分給一滴感情，到了不能從他的土生土長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則他將忘記一切，將是對一切無情，將從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

——徐復觀（一九〇二——一九八二）

當代儒家學者徐復觀先生在「誰賦豳風七月篇——農村的回憶」（收入，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九年，頁七一——八一）這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裡，對於農村生活和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刻關係曾作入木三分的刻劃。徐先生對於近百年來中國人在經歷了歷史的風暴之後，從農村生活傳統中連根拔起，花果飄零的生命狀態會說了以上這一段十分哀痛的話，在邁向所謂「現代化」的今日，徐先生這一段話仍舊不斷地在關心中國文化前途的人士心中激盪迴環，引人深思。

從中國歷史的立場來看，光復後四十年來，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實在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成就。台灣從四十年前的戰火劫餘，傷殘破壞之中，逐步復興，形成今日一片繁榮的局面。這一段「經濟的奇蹟」一方面固然創造了安和樂利的物質生活，但另一方面却也在富裕之餘

帶來了許多社會文化問題，回顧光復後四十年來，台灣地區的發展歷程與農業現代化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民國四十年代土地改革的完成對鄉村社會結構產生激烈的衝擊，創造了強有力的自耕農階層，成為安定台灣鄉村社會的中堅力量，在社會活動及政治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統計數字顯示，民國四十一年台灣地區擁有0.3公頃以下的農田佔總農田的58%，到了民國四十四年土地改革完成後，增加為77%，因此，自耕農佔總農田的比率也由民國三十七年的33.02%，增至民國四十二年的51.79%，以至民國四十五年的57.05%，民國四十八年的58.53%，而佃農所佔的比率，則由民國三十七年的36.08%，降至民國四十二年的19.82%，以至民國四十五年的15.86%，民國四十八年的14.51%。在這種社會急速變遷的趨勢下，自耕農儼然成為台灣農村社會的主體力量。土地改革的成功，使許多農民建築了「三七五新屋」，娶了「三七五新婦」，對未來充滿信心。對農民而言，農業不只是生產的手段，更是生活的方式，也是生活的目的。在農民之間，創造了對農業與農村強烈的歸屬感。

這種狀況到了民國五十年代末期逐漸轉型，農工不平衡的危機逐漸形成，從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台灣農業的危機已很明顯地出現於幾種經濟指標之中。農業成長率急遽下降，從民國54—57年的5.7%降為民國58—61年的1.5%；農業生產佔國內生產淨額比率下降，從民國54—57年的24.9%降為民國58—61年的16.4%；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率以及農產品佔總出口比率也都顯著下降。這種變化使農民對土地的認同感趨於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視土地為商品的心態。另一方面，民國六十年代農業部門的危機日益加深之後，台灣農民農業經營意識中的功利主義色彩日益濃烈，傳統價值觀念日趨沒落。而且，農民對農會的向心力日趨瓦解，農業總幹事選舉每易為金錢和暴力所污染。這是民國六十年代以後，台灣農民社會意識的突出面。到了民國七十年代的今天，台灣農民想些什麼？他們的苦痛何在？今日台灣農

村社會的特質與農民的精神面貌如何？都是我們關心的問題。

為了探索這些與中國文化在台灣的轉型深有關係的問題，筆者從去年（民國七十四年）八月開始，與台大農推系廖正宏教授合作進行「台灣農民價值體系變遷之研究（民國34—74年）」研究計劃。目前研究工作正進行到中途。為了進一步印證問卷調查所得統計資料所呈現的事實，我們遂於今年（民國七十五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以五天時間驅車訪問本省西部農村地區，往返一次，深入各偏僻鄉鎮，依據今年一月間所進行的問卷調查樣本加以抽樣，按址訪問農民，並作成筆記，在前後五天的訪問行程中，每天平均訪問三個鄉鎮，工作十餘小時，頂着炎炎夏日，汗流浹背，但是從與農民的訪問中學習體會許多問題，本文就是根據訪問筆記，並配合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及其他文獻資料，所寫成的紀錄。

七月十八日

當天下午三點半，我們從台北出發，沿著高速公路，一小時就抵達楊梅，在鄉村地區許多魚池的廣告映入眼簾，「四湖大魚池」、「日春魚池」、「安安魚池」、「土皮坡魚池」……等，這大約是民國六十年代初期，農業危機發生後，良田改作魚池那股潮流下的成果。路旁儘是金黃色的稻田，有的已在收割中，大多是採用機械化收割。在楊梅地區，我們首先走訪了住在上湖里楊湖路三段七隣88號的鍾淑英女士。

鍾女士是客家人，三十歲，初中畢業後就不再升學，一家共七口，先生在電子工廠上班。家中種六分水稻，收成時請人以機械代割。鍾女士表示，近五、六年來，覺得稻子的價錢比較便宜，家裡也只種六分，所以種稻的收入佔家庭收入的比例很小，只是種稻沒辦法維持家計。

今年一月間，我們的研究計劃已先由台大農推系的同學為鍾女士做過問卷調查。其中在土地價值這一項，鍾女士在問卷中表示土地是很可靠的東西，而且如果貸款條件合適，願意買地擴大規模。但若是為了改善家庭生活或子女教育，也情願賣地，賣祖產在鍾女士看來並非羞恥之事。在農民性格的問卷裡，鍾女士也表示但願自己不生於農家，而且認為農家子弟不易出人頭地。她對於城鄉生活的印象，則以為都市人較無人情味、冷漠、現實，都市社會比較複雜，善良的人易於吃虧，因此儘管鄉村的物質文明比不上都市，她還是比較喜歡鄉村，不願遷居都市。

鍾女士這種面對當前城鄉生活差距所表現的徬徨與無力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農民聽天由命的人生觀在今日台灣農村仍有相當影響力。在我們這項問卷調查裡，約有 50% 的農民認為現在收入很低，但也無法加以改善，有 20% 的農民認為農村收入雖差，但也不必冒險去都市謀生，有 20% 的農民堅守「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從鍾女士的個案以及調查數據可以清楚的看出，當前台灣農民在農作上雖已相當現代化，但農民性格仍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許多傳統的因素仍有其影響力。

告別鍾女士，我們到了楊湖路的王瑞勳先生家。王先生現年五十七歲，現有八分地，種植水稻。王先生綜合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回答說：

在民國四十年代，我家本來有十多甲地，其中有四甲被放領，分家之後，我分到二甲多。當孩子小的時候，家中生活最苦，那時候只靠種那二甲多的地，不夠維持生計。所以又想其他辦法，像養豬，養雞都做過。後來爲了小孩的教育，在民國62年時賣了一些地，也因此只剩下現在的八分地。現在子女都大了，可以賺錢養家，不必靠種田的收入，而且這八分地也實在不夠日常家用。現在稻子每一百台斤720元，八分地一年

的收穫九千台斤，一年的總收入大約六萬元，扣除肥料、人工等成本，只剩下三萬多，平均一個月三千多。青菜自己種，可是一個月三千多仍不夠家用，因為再加上電費、瓦斯費等，三千多元不管用，還好孩子們都大了。現在有三個兒子在外，老四是軍官，因為在中山科學院上班，所以住在家裡，老唸新竹師專，平常住在學校裡。因為有孩子們在經濟上的幫忙，現在生活還可以，比過去好多了。

王先生種稻的收入不敷支出，但他却覺得生活比以前好過，這當然是由於兒子長大後從農業以外獲得收入，對家庭支出的補貼，這個個案也可以在某種程度內反映出：在近年來台灣農業的變化中，外在的經濟大於內在的機會。來自非農業部門的收入，改善了農家の生活。例如在我們過去的調查之中，就有一位彰化縣田中鎮的兼業農曾先生（64歲，兼土地代書），就近年中南部農村的社會經濟變遷實況提出類似的看法。他表示在民國六十九年前後石油價格猛漲，物價波動的時候，民間對房地產的投資興趣大為提高，政府頒布「都市計劃區內空地限期興建」及「徵收空地稅」等相關法令，一時之間真可謂「處處聞椿聲」，氣勢直可比擬民國四十年代的「三七五新屋」；但是，此後的發展就每況愈下，當年一窩蜂造房子的營造廠倒閉成風，農民利用農閒作體力上的粗活以賺取外快的機會隨之銳減。曾先生本身的代書兼業，前幾年每天是早出晚歸，有時早上在員林，下午得去嘉義洽商業務，但前年開始就大不如前了。這個例子可以印證我們的觀察。

離開了王先生家後，下午六點，我們到達湖口火車站，一路上經過王爺壠轉縱貫公路到新竹。從湖口到新竹的路上，路漸漸寬起來，可以看得出基層建設的成果，當天晚上我們便在新竹市清華大學過夜。

七月十九日

早上7點35分，我們從清華大學出發，8點40分進入台中，然後轉往清水，沿路所見兩旁的本年第一期稻作多半已收成。路上看到兩台電子琴花車，大概是趕去參加喪禮的演出；也遇到一家「東亞戲院」的廣告車，該戲院正放映「心鎖」與「壞女孩」。經過清水公園，8點55分到達清水鎮，接着轉往大甲，沿路兩旁的稻田已收割，稻草已燒好，正整地中。在大甲臨海路3號，我們拜訪了黃菊女士。

黃菊女士，只唸到國小六年級就失學，她在談話中很遺憾未能接受更多的教育，但現在常愛參加農會的講習班。黃女士說道：

我先生他們五兄弟分家時，我先生分到約一甲多。他現在在榮工處上班，因為患糖尿病，沒有辦法種田。稻子的價格約一石600元，大致是一百台斤700元，我們的土地是土地銀行所有地，每年都要納租，大概是一分租金4石稻米。

當我們問到是否可能貸款擴大經營時，黃女士表示：

即使貸款條件好，也不太可能種田，現在年輕人不願意種田，沒有人手，還種什麼田？這一季我種花生，因為其他各季都不能種花生。最近一兩年來，轉作高粱的收入比較好，政府也鼓勵轉作花生，但種花生不大賺錢。現在花生仍用人工採收，有機器可以剝殼，但是不大實用。去年我們申請阿兵哥來代耕，不須負擔工資，只要煮飯給他們吃，第一天有11人，第二天3人，但是多半都不認真。種花生比種稻需要更多的人工，當初是因為政府鼓勵大家種，又說可以軍人代耕，所以才種花生的。

黃女士對目前的種田生活雖感無奈，但是她對下一代的教育却抱有極大的期望，她

說：「我有四個小孩，兩男兩女。小孩唸大甲高工機工科，不大理想，應該唸電工或電子科較好，女孩唸夜間部，都在用錢，家裡負擔很重。我自己沒有受多少教育，很遺憾，希望以後兒子能夠多讀書。」這種對子女教育的態度在本省農民之間相當普遍。正如一位在今年一月間參與我們調查研究的學生所寫的工作報告中所說的：「一般農民對子女教育普遍相當重視，表示唸書才有前途，他們都很重視知識，受訪者只要有小學程度或幾年學習程度都會要求自己看問卷，常常看得懂每個字，但不知其意，却也覺得很樂。也有一些比較努力吸收知識與外界訊息的中、老年人，報紙、電視樣樣都看。」這種狀況很可以反映本省農民現代化的一面。

在大甲鎮，我們接着訪問了臨海路11號的吳聲鏞先生家。吳先生現年六十四歲，是專業農，未曾入學，但能識字。生有四男一女，除女兒外，四個兒子均已成家。原來家中有田地四甲多，現已分家，吳先生自己耕作一甲二分多的地。今年開始轉作高粱，收成還不錯，一甲地收成好的話有一萬多斤。在我們和吳先生的訪談中觸及了當前農民對土地的觀念問題，值得加以討論。吳先生很感慨地告訴我們：

過去小孩還沒長大時，生活比較苦，種田不賺錢啊！現在機械化了，但所需成本也高，而且納水租一甲地要1000多元。即使貸款條件好，也不可能再擴大了，現在少年仔都不種田了，光靠老人是不行的。

我們這裡的地價比較低，一甲才十多萬元。如果耕作土地銀行的地，每甲地一年要納15石稻子。但是如果要機械化耕作，像割稻機一架要30萬元，自己根本沒有能力買。

現在僱人種田，一人人工是500元，包吃。三、五年前的收成比較差，現在因為肥料

充足，收成比以前好。

吳先生接着又說：

如果兒女願意繼續種田，我倒也贊成，但是未來是不可知的。我在世之日，土地是不能賣的，未來的時機也不知會怎麼演變，也許有一天錢會貶值，但土地還是在那裡，是最可靠的。

種田實在很苦，最近政府規定每甲地只收購30,000斤。一甲地一共收30,000多斤，商人又壓低收購價值，算一算，一甲地約收20,000元，再扣去鐵牛、肥料等成本，等於是白做。繼續種田，可以說只是為了顧全這土地，但是這裡的土地不值錢，又不會增值。我們這裡的土地，靠近路邊的因為可以蓋房子，所以貴一點，一般農地的價值都很低。

在一月初我們所作的問卷調查中，吳先生在「土地價值」一項中表示：賣祖產不是丟臉的事；也情願爲了兒女的教育或改善家境而賣地，同時認爲土地是很可靠的東西，而且在種田無利可圖之時，也不願賣掉耕地讓他人經營。我們拿這項調查結果和這次訪談對照，吳先生對土地所持的態度是有些矛盾而又極其無奈的。他並不堅持土地一定不能賣，所堅持的只是土地是最最可靠的東西，它就在那裡，跑不掉，「有土此有財」也不會因貨幣貶值而失去其價值。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是他們所擁有的農地地價甚低，與他對土地的期望又不能相應，矛盾與無奈皆生於此。

吳先生對於農地所表現的矛盾感與無奈感並不是特例。我們在大甲所訪問的另外一位耕作六分地的蔡雪女士也有同樣的矛盾，蔡女士生活很苦，他告訴我們：「我家的六、七分地，種的是稻子和花生，稻子一石700元，若扣除農藥等成本，只剩一點點。如果遇到大雨或

颱風，就更苦些，最近一兩年，因為風雨不調的緣故，收成不好，生活較苦。更早些時候，我父親種田，因為不太會用農藥，收成也不好。貸款條件如果可以，我先生有點想擴大一點，我們自己有一台耕耘機，有時候就以這部耕耘機幫別人做，依面積而計算報酬。在我們全家的收入當中，用耕耘機幫別人做，一年收入兩萬多，自己的地收入三萬多，不太夠家用，我自己有時到外面做女工來貼補家用。」但是，在這種艱苦的生活之下，蔡女士却認為不應賣地，因為「土地是祖傳的，不到不得已的時候，絕不能賣土地。土地只能增加，不能減少，而且以後希望一代代的傳下去。」

吳先生與蔡女士的態度雖有不同，但都在某種程度之內視土地為保值的商品，這種態度在日本省農村已隨着農業現代化而日漸普遍。我們的學生在調查報告中這樣寫下他的農村見聞：「大多數農民聽到農業訪問都回答：『農有啥好？農就倒了啊！』青年外流嚴重，村中只剩中老年人在家勉強做。大多數年老農民無知識背景又固守『自家田自己種』的觀念，不善與人合作，也沒有將來計劃，表示將一直做到老死，再將地賣了。」

這次的農村訪問經驗，進一步印證了我最近從文獻資料的研究中所獲得的印象：光復以來台灣農民的農業意識變遷甚大，農民對土地的看法經歷了很大的變化。民國四十年代的台灣農民一般言之仍具有相當濃烈的傳統性，土地對他們而言是生死以之的安身立命之所，農業對他們而言更是一種生活的目的，兩者都充滿了「神聖性」。但是，到了民國六十年代以後，土地與農業的「神聖性」逐漸消逝了，農業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許多農民也把土地視為商品，兩者都充滿了「世俗性」。民國六十年代以後，台灣農村所盛行的「炒地皮」風氣與作物多元化的發展正是這種從「神聖性」走向「世俗性」的最佳反映。這種從「神聖」走「世俗」的土地觀念是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大體上說，民國四十年代農民對土

地的認同感到了今日已被疏離感所取代了。農民從土地裡游離出來了，他們不再是費孝通筆下的「根植於泥土」的農民，他們已成為「現代化」的農民，充滿了營利取向。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土地商品化的社會心理却也就是為什麼農民把農業視為副業，但是他們仍不願意放棄土地的心理原因，他們認為土地仍是一種較可依賴的商品，在經濟不景氣時可以作為最後的保障。這種心理正是當前政府推行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最大的內在障礙。

當天上午11點5分，我們離開大甲臨海路，折回清水，11點30分到大雅，經大雅鄉農會轉上高速公路，12點10分到達西螺休息站。午餐後，大約下午1點20分，我們進入雲林西螺。首先，我們來到公館里115號的王榮川先生家中。

王先生現年41歲，未曾入學，但能識字，是專業農，家中有三個小孩。他家裡種了4.5分的田，種的是稻子，這一季收成後改種芋頭，同時也幫別人做一些。他家最近兩年收入較差，不想擴大經營。王先生家中買了部收割機，有時也幫別人收割，收取一些費用，他說：「收割機一部85萬，是向土地銀行貸款的，分七年攤還，每年兩期。若是幫別人做，工錢大約是一分450元，一甲4,500元，其中還依地形不同而時間所需有所差異。我們公館地區將近300戶，共有十多架收割機。本地一甲約收成5,000多斤，本期應該是『正頭』，比第二期多一點。有人種蒜頭外銷，但經過商人、海關課稅之後，農民真正的收入很少。」

在今年初我們所做的問卷調查中，王先生對城鄉問題的看法與前面所訪問過的幾位農民一樣，排斥都市的物質文明而喜歡鄉村的純樸，最不同的是，當問到是否同意農民的生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時，王先生表示不同意。在作農的前途方面，王先生在問卷中選擇了「近年來，農業利潤雖然不好，但我還是喜歡繼續務農」這項看法，但是在今天的訪談當中，王先生告訴我們說：「做農不好，但是我現在年紀大了，也不容易去工廠，轉業是不太

可能的。以後小孩子絕不讓他們做農。」從問卷調查與親自訪問中，我們發現王先生所以選擇繼續務農，實在不得已，而非真是喜歡務農。這也和今年初負責西螺，虎尾地區調查的同學，回學校後報告中所提到：「有的農民選了這一項，但並不是喜歡務農，而是不得已或是一種無奈（如想轉業不成等）」的觀點是一致的。我們從455位樣本農戶所作的調查分析發現：教育程度低的農民較偏向「利潤不好，但仍喜歡繼續務農」的態度；而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則認為「只要努力就可獲得相當利潤」。王先生的態度印證了我們的研究結論。

在西螺我們接著走訪了公館里77號的林福先生，林先生現年30歲，家裡種了3分多的地，主要是他67歲的父親在做。原來林先生在家裡幫著種田，到了20多歲才去做工。家裡種田，如果扣除割稻機、耕耘機和金寶螺藥的開支，餘下的差不多只夠吃飽。也因為種田不賺錢，所以家中原有9分多的地，後來賣掉許多，剩下現在的3分多。林先生最近遭遇一件不幸的事，他有個13歲的兒子，還差三天就可以從國校畢業，却在西螺溪底揀沙石商人所挖的沙洞中溺死。林先生說：「我因為做工，沒有時間，也沒有錢請律師，去告那些商人，只能到學校去講，要他們注意學生的安全問題。」林先生談到這件不幸時，神情哀傷落寞，聞之唏噓。我在同情之餘，聯想到我們最近所做農民價值取向的初步量化分析結果。這次調查數據顯示：當前台灣農民對自然的態度已由過去的順從取向與和諧取向，走向主宰取向（佔55.5%），農民的時間取向也以「現在」取向（佔56.7%）為最多，「過去」取向僅佔16%。凡此種種，都顯示出傳統的「農耕心態」在現代化的衝擊下業已完成了轉化。農民的關係取向雖已由傳統的個人取向，但是，當時本省農村中傳統親緣社會關係網絡解體，而現代法律體系尚未深入農村，為農民提供個人利益保障，農民成為孤伶伶的個體，像我們訪問的這位林先生，慘遭喪子之痛，却未能透過適當的法律管道來爭取公

平與正義。這是台灣農村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從「團體取向」轉化為「個人取向」時，特別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離開西螺之後，我們上高速公路南下，一路所見第一期稻作都已收割，並已完成第二期稻作的耕田工作。在下午四點半，我們抵達高雄縣岡上鎮，訪問了謝明壽先生。在與謝先生的訪談中，我們發現農田水利會供水與農民需要之間的差距問題。謝先生說：「水利會的水租一年二期，不論農民是否耕作或收成如何？均需繳納。水利會在每年六月、七月供水，我們的田地不吃水的也必須交租。等到十二月田地缺水了，水利會却不供水。我們拿自己的抽水機去抽水，却被水利會以偷水的罪名加倍罰款。」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性問題，值個有關單位加以注意。

謝先生現有三甲地，在談話中，他表示如果政府能給予長期低利貸款，條件適合的話，他願意貸款用這三甲地來經營魚塭。謝先生對貸款問題的態度，與我們的問卷統計結果大致相近。從我們的問卷統計發現，偏好向農會農會或銀行借款的農民，較傾向於採用創新農業經營方式，相反地，排斥現代化借貸方式的人，在農場經營方式上也比較保守。

結束了與謝先生的訪談，已經下午五時，我們就由路竹經省公路去台南，當晚宿於臺南市：

七月二十日

這天早上我們起得很早，依照事先的計劃，早上7點35分，我們就從臺南市出發到北門，沿路兩旁都是芒果樹，這是台南縣的特色之一。8點38分到了玉港，以前叫「西埔內」，現在合併為「玉港村」，因為沒有門牌，我們找了一陣子才找到預定訪問的對象吳澄

旺先生家：途中經過吳氏宗祠，建築美侖美奐，可見北門吳氏的興旺。

吳澄旺先生現年59歲，專業農，初中畢，在當年也可算是讀書人了。吳先生談鋒甚健，也頗有自己的看法。他曾任農會理事，兒子今「民國七十五年」年起擔任新鄉長的秘書，家中頗有資產，在我們這一次訪問的農家中是較為特殊的。我們和吳先生談到了許多問題，覺得收穫甚為豐碩。

在台南縣北門地區，錦湖的土地較值錢，因為錦湖土質好，政府每年都投下經費來改善地質，「西埔下」地質就比較鹹，一般農家收入也比較差。吳家有一甲左右的田，本來今年要「放空」（休耕），但怕恥笑於人，所以仍種了稻子。北門地區的傳統稻作收入雖然並不好，但是作物產量比起三、五年前已大為增加。以前多是看天田，來一次「鹽水颱風」，就需要等好些年才能恢復地力。現在改良了，產量比以前好。一甲地收1,000斤是「一割」，10,000斤是「十割」，以前收七割就不錯了。現在有農業……等新技術的施用，收成較好，但是成本也提高了，四湖方面的農耕隊，在農忙時全隊一起來代為收割。「西埔內」地區的耕作面積小，所以沒有人買機械。這個地區傳統稻作雖然收入差，但是許多農田多改為魚塭，養豬等農村副業也頗為發達。吳先生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說：

我經營3甲魚塭，因為魚塭比較省工。這邊的土地一甲50萬，魚塭一甲要100萬，北門鄉全鄉共有500多甲的魚塭，許多是養草蝦的。魚塭也是過去比較好，最近吳郭魚價錢不好，有時運到台北時價錢太低，乾脆拿去勞軍。在魚塭旁買的魚和魚販的售價大約差一倍，近來因為採單性養殖，而且用飼料養，所以魚塭的產量也增加了，雌性的魚還能「結繫」，技術進步太多，現在的農民比以前的漁業專家還要內行。

他接著告訴我們說：

另外，我還養豬，現在養170隻，某位立法委員在官田也養了好幾萬隻。但是我們這裡養豬都提心吊胆，因為治安不好，常有偷豬的事發生。我弟弟養了二百多隻豬，每隻都在100公斤以上，被偷過兩次，一次損失四十多隻，另一次87隻，偷豬案從來沒有破過。以前晚上7點到8點常停電，有位農民7點停電時回家去，7點50分再去，豬已被偷走，只有一次有人被偷30隻，但因開車運豬的司機被農民丟石頭打傷才沒有偷成。猪價一好轉，就有人來偷豬，這必定是有個集團，而且可能是有後台靠山，也有專門收買贓豬的人。警方應該在半夜凡是看到載豬的都盤問一下才好，我每晚都在豬舍睡，豬舍還裝了防盜器，但有的規模較小的豬舍就沒有裝防盜器。

吳先生在談話中表示農村治安不寧帶來農民莫大的痛苦，所以一旦當場抓到小偷，莫不痛撻一頓以消長期怨氣，只是抓到小偷的機會太少了。

吳先生曾任農會理事，對許多農業政策體會較深，他自己養豬，就加入當地農會的「共同運銷」，豬價不錯，現在每公斤7元至9元不等。吳先生對政府推動的「共同運銷」政策非常贊成，他說：「『共同運銷』的好處是可以調配入市的數量，由調配站來安排。因為在供需之間加以適當的控制，價錢不會太差。省、縣、鄉鎮的農會都抽成。像賣豬，從抓豬開始就由農會負責，如果豬在運送途中死了，則以當天平均價格算，對養豬戶有利。」但是，對於政府的糧食收購政策，吳先生則指出執行上的有偏差。他說：「收購制度不合理，像玉米，沒有倉庫，根本不能交。政策是很好，但是地方的執行與配合有問題。而且，也容易因官商勾結而受生意人控制。此地實施玉米收購保證價格，常有商人到外面買更便宜的，而向農會用農民的名義來交，交到滿額，等於是賺政府的錢。」

吳先生及鄰近養豬戶都積極參與「共同運銷」，這項事實與我們的調查統計資料可以互相印證。我們的調查資料顯示：高度農業地區對傳統的自家獨力經營方式較執著，只有 22.6% 的農戶願參加共同作業；低度農業地區則有 38.5% 的農戶願意參加共同作業。吳先生所住的「西埔內」比較上可視為低度農業地區，共同運銷或共同作業政策較易推行。

農民對農業前途的看法是我們這次訪談的重點之一，吳先生對農業前途的看法甚為悲觀，他的意見很具有代表性，他說：「現在做農沒有用，農家主要靠的是農業以外的收入。我現在做的這些，還不如去開個雜貨店。兒子夫婦以前在南鯤鯓，一個月收入合計兩萬元，但種田·甲一年要有兩萬元就很難了。所以很多人離鄉背景找尋別的出路。我老了，找不到別的職業，只好種田。這些土地在我死以前，最好賣了算了，因為現在價錢比較好，將來就難說了。土地如果能以公定價格賣了，我情願去做工。八萬農業大軍困難太多。農家如果沒有幾個兒子到工廠做工賺錢，家裏的生活不可能好。我家附近的農民多半是『日本製』的農民（意指農民都是光復以前出生的一代），只有一個40多歲的是因為眼睛不好才務農。」

吳先生的意見與我們兩年前所作的問卷調查資料有可以互相參證之處。當時接受訪問的農民中 59.3% 對農業前途表示悲觀，尤其以區域發展的農民和參加專業區的農民為最。愈是農業色彩濃厚地區的農民，對農業的疏離感愈強。隨著對農業認同的薄弱化而來的，就是對農村歸屬感的冷漠與淡化。因此，農村人口的外移是可以預期的現象。吳先生接著說：「二十年前，我兒子以前在北門讀書的時候，一班70人，現在玉湖國小全校才70人，分三個班，全校教職員共9人，今年的及齡學童也只有16人而已。北門鄉人口有一萬六千多人，實際上在鄉居住的可能不到一萬人。現在留在此地的人多半是以前的富戶，因為土地多，所以離不開，以前貧窮的人才出外。過去去高雄的最多，現在各大都市都有，老一輩的去台北，又牽

引少年郎出去。」

從城鄉人口的推移，吳先生又談到了農民精神的轉變，他說：「光復時我16歲，正在大阪，回到台灣那時候吃穿都差，一般人都勤儉。現在農民養殖的草魚，大的留著自己吃，其餘才拿去賣，刻苦耐勞的精神已沒有了。我年輕時，工作經常拼到半夜，以前我有個親戚作鄉公所建設課長，下班後還換衣服下田，現在人大概不會吃苦了。以前要做很多工才能買一斗米，現在一工就可以買好幾斗米，工資太貴了。在北門鄉不可能純粹靠種田而能買機械，買機械的都順便受雇，利用不同的生產期，一路做下去。現在的『勞動基準法』對工人不錯，農人却無從退休，農民保險太少，幸好，我參加了漁會的保險，一年賣14萬以上的魚貨就可以免交漁保費，否則須交五、六千元。北門鄉農會最可憐，以前『漁』、『鹽』、『農』三分天下，現在『漁』最好，靠『漁』來維持。」

結束了與吳先生的訪談，我們於10點20分離開北門，經南鯤鯓向東石方向北上。南鯤鯓代天府是南部重要的民間信仰中心，我們北上途中在十分鐘內在路上遇到了兩個進香團。11點5分進入嘉義，經「網寮」，兩旁稻子都已收割，而且播種了，一路上魚塭也很多。下午2點到了民雄，我們在雜亂無章的鄉村道路上，花了半個多小時才找到我們在民雄地區的預定訪問對象。住在民雄中央村74號的劉清城先生。

劉清城先生現年53歲，初中學歷，劉先生曾任農會理事，弟弟是台大農學院教授，許多農業新知均能獲得。劉先生一共有五甲地，他認為這兩年稻子價錢較差，所以收入不理想。若是要轉作，又覺得沒有保障，因而不感興趣。即使貸款條件可以，他也無法再買地擴大經營，主要是因為人工缺乏，做不了那麼多。他也參加了共同經營，效果不錯。他告訴我們：「現在一分地收成1,100或1,200斤，產量增加了，但價錢却低，一甲地一年才收7萬

上 民雄農民使用機械進行播秧工作
下 南部鄉間赤足徒步的和尚



多，扣除成本後，一甲實在賺不到一萬元，我們家是因為田地面積大，才能夠維持下去。家裏田地將來老三要繼承，老大現在台南，老二在台北，都已有職業。」劉先生很能代表傳統農民堅忍不拔的精神，認為田產一定要繼承下去。從他的談話中，我們也瞭解到政府正推行的「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有其限度，也許以三甲左右為其極限吧！

離開民雄之後，我們繼續北走，在斗南附近我們碰到那位立志以赤足環島徒步的和尚，每走三步就伏地叩首一次，和尚的後面跟著一小隊的徒弟、信徒和一般民眾。和尚在接近人體溫的炎日之下，以篤定堅毅的眼神三步一叩地前進，許多旁觀的民眾都隨著雙手合十禮佛，非常令人感動。

我們在下午3點40分到達西螺，正好下起大雨，經過西螺大橋，使我想起四十年前的愛國歌曲「台灣小調」中的歌詞：「阿里山峯入雲霄，西螺建大橋，白糖茶葉買賣好，家家戶戶吃得飽」。大約下午四點到了彰化北斗鎮，看到該地的農會建築新颖，而且排水溝寬廣，基層建設成功。途中我們向一家貨運行問路，到4點40分時，才找到我們的訪問對象：北斗鎮神農路9號的徐旭堂先生家。

徐旭堂先生，現年30歲，學歷是國中一年半，我們和他談了不少問題。徐先生現在家裏種3、4分地的田，有時也去做工，現在的工資男的一工約四百或五百元，女的一工約三百或四百元。他表示，就種田來說，一分地必須「十割」（即收成10,000斤）才划算，這一期徐家收成約9,000斤。去年稻谷的價格100斤200多元，今年100斤才20元，一分地收入3萬元，扣除成本以後所剩無幾。徐先生認為如果貸款條件好，而且在能力範圍之內，願意再買七、八分地。他認為，現在做農如果有一、二甲地，差不多就可以賺錢，也就不必再去做工了。現在徐先生的家庭收入以做工為主。每年九月到翌年四、五月間工作機會較

多。徐先生的祖父有七、八甲的地，四兄弟分家下來，現在只剩下七、八分地了。徐先生有一兒女各一，他說：「到了他們的時代，又不知會如何？」一副茫然的表情。他說：「現在科學發達，田裏的問題農民差不多都知道怎麼預防。我的知識都來自自己的經驗及參加四健會所得，對自己的田地性質大致能了解。稻谷的價格，屏東方面100斤800多元，到了我們這裏跌到700多元。我有時去幫有二、三甲地的大農做工，還不打算轉業。我爸爸是農會代表，今年54歲，家裏的田地在他名下，再分給我們兄弟做。」

我們和徐先生談到政府正在試辦中的農民保險業務，徐先生說：「北斗鎮農會業績不錯，總幹事已做八、九年了，他爭取到農保。農保應該把兒子也包括在內，現在農會會員一戶只能保一人，實在沒道理。保險費很便宜，但可以參加的人太少，我全為六人，只有我爸爸才有資格加入，應該全家一起加入才對。」徐先生的意見正代表當前台灣農民的共同心聲。筆者過去曾研究光復後台灣省議會議員對農民保險問題的質詢，發現在民國35年至61年之間，關於農民保險問題的質詢總共只有八次，可謂微不足道。從第四屆開始才逐年增加，尤其以第五屆質詢18次，第六屆32次最為可觀。在民國62年到70年之間，議員總共質詢農民保險問題50次。因此，我們可以說，農民保險時間愈後愈引起議員的注意。在以上共58次的質詢中，有一半以上是質詢農林廳長關於農民保險的實施日期問題，其次是討論政府應有農民保險之觀念，再其次則是討論農民保險制度之細目。省議員所反映的正是農民的心聲。農民保險問題確實值得政府部門加以重視。

徐先生一家平時很少娛樂活動，平時大概只是晚上去北斗鎮看看電影就算是主要消遣了。徐先生的談話很可以說明農村文化生活的單調。筆者過去曾為文指出，由於城鄉文化的不均衡，所以當台北人在藝術季欣賞外國芭蕾舞時，鄉村却為色情歌舞團所侵襲。都市次文

化透過電視以排山倒海之勢侵襲農村。當布袋戲在電視上演時，「三齒」、「西螺七崁」等成爲鄉村兒童心目中的英雄；當港劇「天龍八部」上演時，鄉村地區成千上萬的電視機都只有一個聲音。流風所及，鄉村居民的價值取向與生活方式莫不以都市爲依歸，農村成爲都市的雁羣數。孕育於農村的傳統文化日趨瓦解。鄉村地區的婚喪典禮竟至以脫衣舞演出，尤其可以反映文化崩潰的嚴重性。我們在員林鎮上所碰到的電子琴花車，有衣着暴露的妙齡女郎唱歌演出，這個實例很能顯示現階段鄉村文化問題的嚴重性，值得我們付予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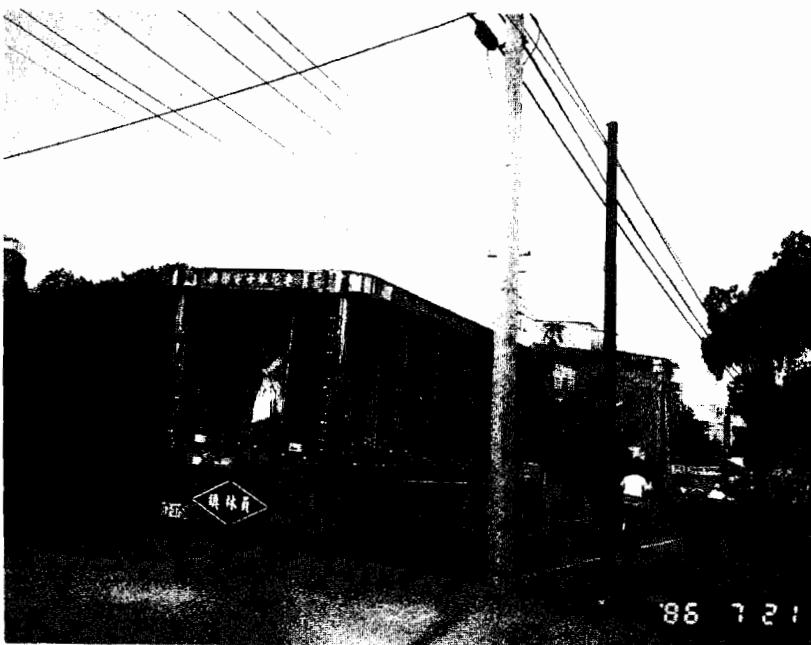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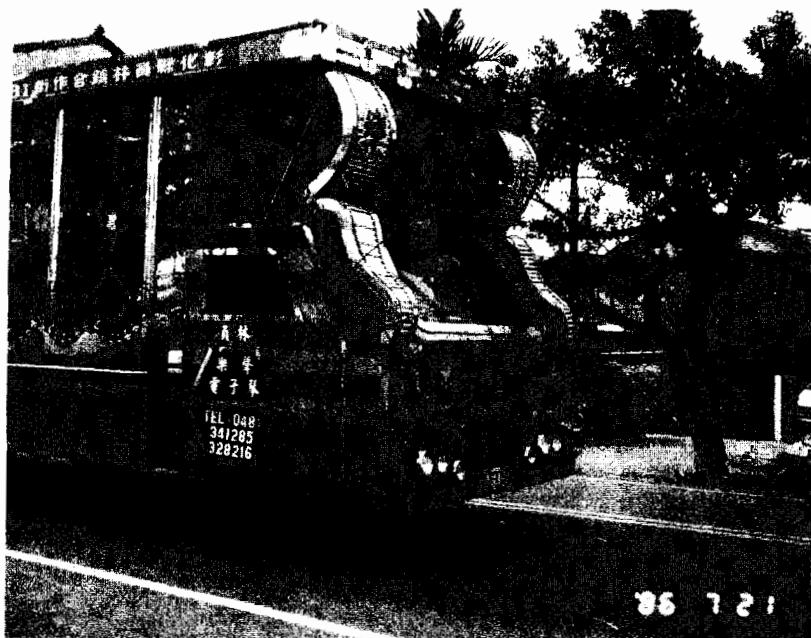
七月二十一日

清晨6點45分，我們經過一個小時的尋找，終於找到了我們預定拜訪住在員林東北里山腳路269號的曹清泉先生家。當時曹先生不在家，他的兒子接受我們的訪問。曹家種了3分多的田，有時也去做工，另外有些山園種龍眼、鳳梨，共六、七分。曹先生表示，目前稻谷收入100公斤700元，扣去工資，已入不敷出，水果的收成也不好。曹先生表示，去年冬那一季的水稻還不錯，今年比較差，價格實在太低。

曹先生，40多歲，在家中排行老大，家裡有三個兄弟，弟弟都到工廠做工，晚上才回家。在工廠做工每人每日約有萬餘元。曹先生自己有時候也去做工，一日約400元，一個月大概可以做7天，當地近山，盛產水果，都是由水果商來收購，如果有錢，當場就可以付款，否則差不多是慢個兩三天付錢。

我們問起是否願意貸款擴大耕地時，曹先生說：「即使貸款條件好，也要夠我能力所及，才能考慮擴大耕地面積。現在這裡甚至有人要不收租金讓人耕種都沒有人願意接受。雖然如此，我只靠的幾分地生活，如果有人要買，也不可能賣掉。一從這一段談話中，我們又

鄉村文化的現況：員林的電子琴花車



印證了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政策在現階段確實有其障礙。

山區農家生活比平原地區農家生活更沒有娛樂之類的文化精神生活，正如曹先生說的：「晚上回家大概就是看電視，不管那一台，什麼節目都可以，沒有什麼特別的偏好；或是大家在樹下納涼聊天，生活都不行了，還談什麼娛樂，這附近的人多半都是這樣。本地的農戶都是有幾分地，沒有人有幾甲大的農地，我父親時的耕地也差不多是這麼大而已。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在這種農村地區普遍缺乏娛樂活動的狀態下，往他縣市的寺廟進香之類的活動除了宗教意義外，也兼具旅遊功能。在我們離開員林往彰化的路上，碰到一隊來自大崙普崙寺往虎岩山的進香團，大小客車計約50輛，聲勢浩蕩，並有電子琴花車隨行，有妙齡女郎在車上演唱，衣着極少，反映現階段農村文化問題的嚴重性。

我們約在上午10點40分進入苗栗卓蘭，道路兩旁所見多是梨子、葡萄、絲瓜等果園。費了許多時間，我們才找到卓蘭鎮成功路65號的林春貴先生家。

林春貴先生，現年59歲，未受教育，是客家人，也能說福佬話（閩南語）。林先生在土地改革以前是佃農，他現在所耕作的三分地是土地改革時向地主放領來的。他回憶過去，覺得上地改革完成時是黃金時代，後來就一直壞下去了。三、五年前還可以「吃不飽、餓不死」，現在更差，還得靠大兒子出外做工拿錢回來補貼家用。他對農業前途也像其他農民一樣很不樂觀，他說：「我將來老了，如果兒子不做，這些田也只好任其荒蕪。年輕人如果有其他職業，就不做農，只有失業後才乖乖地回來種田。我們這裡天災就多，收成減少，大家都一樣。只有少數人施肥等技術較好，還能維持一定的收成。水果也不好賺，葡萄常會爛掉，楊桃因為價錢不好，這幾年來差不多都鋸掉了。」從土地改革到現在，四十年來台灣農林經歷的變遷實在太大，許多未受教育的農民就在歷史的漩渦中載浮載沈，林先生只是許多

本書作者攝於竹東石潭村



例子中的一個而已。林先生因為替大兒子娶了一位印尼新娘，加以翻修房屋，負債達五十萬元，是以地契向農會借的。他最羨慕的是上下班的公務員，生活安定，而且收入還可以。

上午10點30分我們離開卓蘭，下午一點到大湖，山路兩旁有許多觀光果園，這是農業不景氣中一項新的農場經營方式，成功的果農收入不錯。下午3點40分，我們抵達竹東石潭村。這個地區的稻子大多正在收割，割稻機往返稻田之中，馬達之聲不絕於耳，譜出一首現代化的「農村曲」。我們在石潭村訪問了正在田裡工作的劉代打先生。劉先生種了七分地，一分地收500至600斤，算是很好了，和南部比較起來，北部地區的稻谷收穫量是少了一點，這大

大概是氣候和日照等因素所影響，正應上了一句古話：「莫怨太陽偏」。劉先生生活比較苦，他告訴我們，一分地代耕費用要700元，七分地耕耘費5,600元，加上肥料等支出，算起來收支相抵，等於是白做。老是收成不好，做了反而虧本。今年的收成不好。去年的保證收購價格，1,000公斤是9,400元，今年的價格只有6,700元，三年前是8,700元。在這樣艱難的狀況下，劉先生和兒子住在一起，兒子在工廠做工，月入有11,000元，差可彌補家裡的開支。以工補農維持收支平衡，是目前全省農家の普遍現象。

結語

這次的西部農村訪問，雖然因為時間限制，前後只能有短短的五個工作天，但是將研究資料與農村現況互相印證，却收獲良多。

首先，我們發現在我們所訪問的農民中有相當多數表示無力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少數想貸款擴大農場規模的農民則想用來經營魚塭或其他收入較豐的作物。這一項事實的涵意值得進一步討論。民國70（1981）年，廖正宏教授的研究發現雖然農業不景氣，但仍有69.3%的農民認為只要貸款條件合適，願意擴大經營規模。廖教授在今年一月所做的調查所獲得的結果也令人感到興奮，農民同意「如果貸款條件合適，願意購地擴大經營規模」的比例高達77.6%（同意62.2%，很同意15.4%），這個發現能否間接地解釋為：農民對農業比幾年前更具信心，願意投下資本、勞力以擴大經營規模呢？換言之，量化統計數據與我們親自訪問印象是否矛盾呢？

對於這個問題，可能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這項「矛盾」反映當前台灣農業正處於十字路口。一方面從民國四十年代土地改革以後所培養的小農

階層面臨轉型乃至消逝，小型家庭農場已不符合經營規模，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勢必成為大勢之所趨。但是，另一方面，傳統的「有土斯有財」的心理仍未完全崩潰，我們的統計數字顯示農民貸款購地意願高，可能是這種心理的反映，也許並不能解釋為農民對農業信心大增。

第二項可能的原因也許是作調查的時間問題。我們從全省各鄉鎮抽樣455戶農民進行問券調查時，是在今年（1986）年一月，當時正值去年二期稻作收成不久，那一期稻谷的價格甚好，1,000斤可賣8,000元至9,000元，農民甚為欣喜。我們七月去訪問時，本年第一期稻作剛收割，價格大跌，農民甚為失望，從南到北，士氣低落。這種狀況，不僅傳統稻作農家如此，非稻作農民也有類似情形。一位在高雄縣旗山地區作問券調查的學生在報告中就這樣寫道：「農民對農業前途，多感失望而無助，香蕉因黃葉病收成與付出不成比例，大約每一千株香蕉，只有四百株可以採收，其餘六百株皆白費心血，入不敷出為普遍的現象，農民普遍抱怨賺來的錢貼成本都不夠，政府還要課稅。」

從農民對作物價格升降的高度敏感反應，我們可以連繫到農民的時間觀念的分析。廖正宏教授對農民的時間觀念所作的問券調查分析發現：農民的時間觀念以現在取向比例所佔的百分比最高（56.7%），其次是未來取向（36.7%），而過去取向的比例則微乎其微（0.6%）。這項事實可以告訴我們，現階段台灣農民非常重視當前所能得到的是什麼，而不是過去他們會有什麼，或未來可能擁有什麼。這一點部份地反映台灣農民性格正從傳統性到現代性的過渡。既然農民的時間取向如此重視「現在」，那麼以上所說的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也就可能不足為奇了。

其次，在這次的巡迴訪問中，我們發現農民對土地的認同感已有轉變。在民國四十年代

土地改革完成後，農村一片欣欣向榮，農民以農業為生活方式而不是謀生手段，但是隨著經濟的起飛，這種「農本主義」心態已開始轉變，筆者在前文中提到民國六十年代瀰漫於全省的「炒地皮」風氣，就顯示出以土地為商品心態的興起了。土地現在不再是農民安身立命之處所了，在這次訪問中許多農民告訴我們，寧可賣了土地去打工，改善家計，只是年紀已大，無法轉業了。廖教授的調查數據也印證了這項看法。調查資料顯示，現在大量農民視土地為一種商品，不再視為生活的保障和地位的象徵。因此，高達73%的農民認為賣掉祖產不一定是丟臉的事（同意：67.9%，很同意：23%），也有一半以上（57.6%，其中51%很不同意，52.5%不同意）的農民，尤其是35歲以下的農民或兼農業，不認為土地可以用來衡量一個人的身份地位。目前農民視子女教育比土地的價值更重要，有75%～93.4%同意，19.6%很同意）甘願賣土地也要讓子女受高等的教育，尤其是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的農民更如此主張。從純粹經濟發展觀點來看，這種對土地的價值由認同轉向疏離，由感情轉向商品的心態，也許有助於經濟「自由化」的發展，但隨著這種心態的普遍化，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後果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

總而言之，農村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基礎。台灣地區四十年來現代化的成功，不僅完成了農村面貌的轉變，也帶動了農民價值取向的變遷。這些變遷與發展對中國文化在台灣地區的轉化必然會造成深刻的影響。讓我們在邁向現代化的同時，也注意農村建設與中國文化的深刻關係，為現代化的經濟「高速公路」兩旁保留一片綠色的安全島。（完稿於一九八六年八月）